

包容性文化对种族隔离城市 “二元结构”的缓释问题探析

——以南非约翰内斯堡为例^①

梁凯宁 张忠祥

摘要:完全民主化的新南非是一个年轻国家,直到现在,种族隔离历史对其造成的阴影还留有痕迹,尤其是在约翰内斯堡这个种族隔离斗争的前沿城市。实际上,约堡具有南非主要城市尤其是大都会圈共有的一系列“城市病”。特别是种族隔离历史加持下的“通病”,这种“通病”一方面表现在殖民政策在塑造城市空间、城市布局、城市规划乃至城市发展速度、力量方面的消极性上;另一方面是潜移默化塑造了社会和种族的不平等——城市权利的实际享受者发生“位移”,城市空间的身份定义被“异化”。本文旨在研究南非城市文化中的包容性对一个“有缺陷的城市”或“受到历史伤害的城市”的缓释效能,具体从包容性文化对削减一个城市历史上的“伤疤”,以及对由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资本主义盲目性所造成的城市畸形错位发展能够起多大的“纠正”效果。从而最终分析和论证出城市文化中的包容性对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乃至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包容性文化 种族隔离城市 二元结构 约翰内斯堡 缓释

城市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是一个城市历史的沉积。不同的城市文化

^①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泛非主义与非洲一体化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1900—2021)”(23&ZD325)子课题阶段性成果,并受到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上海师大世界史项目和上海师范大学一流研究生教育项目“博士拔尖计划”资助。

决定不同城市的“面孔”。^①如若将“包容性”赋予城市当中,并逐步培养构建为城市的一种文化,尤其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对于提升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具有重要的价值,将会给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活力和韧性。^②这里的“包容性”一词借鉴了美籍奥裔经济学家约瑟夫·熊比特(Joseph Schumpeter)的增长理论(内生创新增长理论^③),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保证财富获取方面机会平等;要允许经济多样性、良性竞争和创造性破坏;要鼓励产业突变,不断从内部对经济结构进行革命,不断地破坏旧的结构,创造新的结构。最终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④包容性城市概念与包容性增长概念具有相关性,即在城市化过程中,要保证机会均等,尤其是从中长期来看要为城市穷人带来经济利益;满足一系列城市不同阶层的需求,通过文化融合来使各个阶层目标逐步一致,缓释矛盾,增进和谐;最终达成城市战略和资源配置清晰明了的目标。^⑤

南非城市历史和城市化发展在整个非洲具有典型性。首先,南非的城市,是南非历史记忆的一个特殊标志物,每一座城市都能够讲述南非一段独特的历史。如开普敦(Cape Town)是南非殖民史的开端,有“城市之母”之称,而约翰内斯堡^⑥(Johannesburg)则经历了南非的矿业发展和种族隔离斗争等历史,是南非最独特的城市。1910年随着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纳塔尔(Natal)和德兰士瓦(Transvaal)四大殖民地合并成立统一南非联邦,约堡的城市发展走上了快车道。1961年随着切断了与英国

① 张经武:《我国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的多元成因》,《都市文化研究》2022年第2期,第114—137页。

② Rammelt F, Gupta J. “Inclusive is not an adjective, it transforms development: a post-grow interpretation of inclusiv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science&policy*, vol.124(2021), pp.144—155.

③ 熊彼特指出增长是一种特殊现象,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经济中的创新是“创造性破坏的永恒风暴”。所谓增长,就是实现生产要素“新组合”后的经济进步,发生在经济生活内部的质变,而不是从外部强加给它的。它是流通渠道的一种自发的、间歇性的变化,它是对均衡的干扰,它总是在改变和取代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而不是意味着价值规模的增加,它只是意味着它们边际效用的增长。熊彼特坚信创新实现了经济的增长,他指出,只有经济体制吸收了创新和技术变革的一切成果,实现了经济结构不可逆转的变化,经济才能实现增长。创新破坏了旧的均衡,实现了新的均衡,也就是说,增长是企业家实施新的生产要素组合,使生产手段和方式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由此可见,这里的增长与创新有着一致的意义。

④ 参见:Joseph Alois Schumpeter;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p.20—58。约瑟夫·熊比特,孔伟艳、朱攀峰、姜季芳译:《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37—39页。

⑤ Parker, S, *Urban Theory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Encountering the City*, London: Routledge Press, 2015, pp.23—36.

⑥ 简称约堡,Joburg,文章为了控制篇幅,接下来就用其城市简称。

的关系,约堡城市发展速度有所减慢。1994年随着新南非的建立,种族隔离制度被彻底终结的同时,^①也为约堡城市发展解开了枷锁,城市发展迎来了另一个高潮,城市化迅速发展。总之,南非约堡短暂的城市发展史是经济、政策、历史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中国,非洲城市史研究方兴未艾,当下城市发展问题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当然,国内对城市史的研究还主要集中于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对非洲城市史尤其是南非城市史与种族隔离史之间的关联问题鲜有研究。华东师大尚宇晨博士比较集中地研究了南非的黑人在种族隔离城市化过程中被疏离,以至日益贫困化。^②他在文章《南非约翰内斯堡贫民窟问题研究(1910~1960)》认为种族隔离政府对于塑造约堡巨型贫民窟——索韦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间接地造成了城市的“二元式”割裂。^③在国外对这方面问题研究要首推伊迪丝·霍弗(Edith Hofer),沃尔特·穆萨克瓦(Walter Musakwa),桑德·范拉宁(Sander van Lanen),特里诺斯·浓汤(Trynos Gumbo),斯蒂芬·内奇(Stefan Netsch)和凯瑟琳娜·古格瑞尔(Katharina Gugerell)共同撰写的《包容性见解:约翰内斯堡的两个城市发展项目》(“Inclusive Insights: Two urban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Johannesburg”),文章认为约翰内斯堡被“一分为二”,呈两种迥然不同的城市表现的历史溯源就是种族隔离历史,城市化发展只是加重了这一程度而已。^④南非教授乔治·查尔斯·安杰洛普罗(George Charles Angelopulo)发表于《南部非洲战略评论》(*Southern Africa Strategic Review*)的文章《非洲城市包容性——城市化的比较指标》(A comparative measure of inclusive urbanisation in the cities of Africa)把包括南非约堡在内的非洲主要大城市有关包容性水平高低通过量化指标进行了纵向比较,认为东非内罗毕、坎帕拉、达累斯萨拉姆等城市包容性较高,而

① Beavon, K., “Some Alternative Scenarios for the South African City in the Era of Late Apartheid. In D”. in Drakakis-Smith, Ed., *Urban and Regional Change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66—99.

② 尚宇晨:《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白人政府的黑人城市化政策(1920—1960)》,《世界历史》2018年第1期,第79—95+158页。

③ 尚宇晨:《南非约翰内斯堡贫民窟问题研究(1910~1960)》,《城市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29—47页。

④ Edith Hofer, Walter Musakwa, Sander van Lanen, Trynos Gumbo, Stefan Netsch, Katharina Gugerell, “Inclusive Insights: Two urban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Johannesburg”, *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vol.18(2022), pp.35—58.

南非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等城市包容性较低,但潜力较大。约堡等南非城市包容性增长对南非发展至关重要,它间接决定了人们对南非国家的看法,鉴于此,南非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键时刻,城市包容性的选择决定了未来南非是走向更大的平等和富裕,还是走向不平等和贫困。^①

笔者在这里粗浅选择南非内陆矿业之城——约堡——作为研究对象,并非只是因为它是南非第一大城市,也并非因为它是南非商业、文化和黄金之都。而是其城市中那种受种族隔离制度影响下的清晰割裂感,这种割裂感表现在城市中的里里外外,像用刀将一座城市劈成两半,一分为二,界限肉眼可见,黑白分明,很具有典型性,直到现在这种痕迹仍然存在。^②本文将试着从约堡城市史的角度,通过它独特的城市历史和城市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尤其是其长期受到种族隔离历史的“毒害”,使得城市结构、城市发展水平仍然显出种族隔离造成的隔离感、疏离感和阶级分化的痕迹,去探究包容性的城市文化对于缓释一个曾经历过种族隔离历史影响的大城市的重要意义以及对这种城市竞争力提升的作用和效能。

一、约堡城市历史及其独特性

约堡,它是南非乃至世界上唯一不建在海边或主要河流岸边的大都市,这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或许这是因为驱动其建城的主因是黄金等矿业资产,而非依靠贸易。在1884年发现黄金之前,这里只是一片拼凑而成的简易农场,但此后很快就变成了混乱、暴力、种族隔离的聚居地,因为此地吸引了白人冒险家、淘金者、性工作者、定居者、罪犯、骗子、黑人劳工和来自欧洲的精英——所有人的动机都是为了黄金和发财。初期殖民安排的松散性却在大约20世纪40年代结出了种族隔离的恶果,并“诞生”了一个名为索韦托(来自西南乡镇)的黑人劳工储备之地,同时将黑人驱逐到中心城区之外。并强迫他们只有携带许可证,以表明资格才能短暂停留在这里。从1948年种族隔离制度正式实行到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结束的46年里,约堡始终处于一段独特的历史时期——分裂和不平等、黑与白、富人和穷人——一种割裂的二元状态。^③

① George Charles Angelopulo: "A comparative measure of inclusive urbanisation in the cities of Africa", *Southern Africa Strategic Review*, vol.39, no.1(Jun 2021), pp.1—10.

② Angelopulo G, "A comparative measure of inclusive urbanisation in the cities of Africa", *Wor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vol.22,(2021), pp.100—103.

③ 参见:德波拉赫·铂瑟尔:《种族隔离的形成(1948—1961):矛盾与妥协》,第40页。

种族隔离制度是建立在种族隔离的意识形态之上的。在种族隔离之前，约堡有一些各肤色一起居住的综合社区。然而，南非白人政府希望限制南非黑人进入约堡城区，以防止他们与城市白人竞争，并限制他们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能力（黑人占南非人口的绝大部分）。1950年的《群体区域法》（The Group Areas Act）授权政府限制某些种族群体的居住，允许政府随意消除非白人或融合社区。然而，一方面，豪登省农村贫困和人口过剩迫使黑人们离开土地，前往城市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对工人的需求，种族隔离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这些定居点的暂时性存在（种族隔离的内部矛盾之一始终是一方面需要廉价劳动力与另一方面希望为白人保留工作岗位之间的斗争）。^①因此，大型棚户区在约堡的郊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在建立有限的棚户区权利之前，占屋者的地位在法律上是不稳定的，且这些定居点获得基础设施的机会非常有限。据一项估计，即使在合法的“贫困区”，1976年也只有7%的房屋可以使用自来水，很大一部分没有电——使用煤油照明、使用木炭取暖和做饭。^②约堡的南部、西部等“贫困区”由此形成并一直延续下去，其中许多“幸存”下来的“贫困区”不断向外延伸扩大，它们大多处于城市的边缘位置，成千上万的棚屋争抢有限且凌乱不堪的空间。^③

事实上，残酷的种族隔离政权垮台约30年后，南非的城市在经济和种族方面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后种族隔离政府虽早已废除《群体区域法》《通行证法》（Pass Laws Act）等一系列种族法律，但非国大政府在废除种族隔离问题上仍步履蹒跚。^④如今，约堡的贫困人口仍然主要是黑人和有色人种（有色人种通常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种族，而不是混血儿）。据一项数据统计，2006年至2015年间，所有种族的贫困率都有所下降。但相比白人从1.4%下降到1%，黑人仅仅从76.8%下降到64.2%。^⑤因此直到现在，黑人仍是贫困人口的“主力军”，黑人仍然被迫居住于“贫困区”。随着城市化发展，他们大批量涌入

① Lemon, A., *Homes Apart: South Africa's Segregated Cities*. London: Paul Chapman Press, 1991, pp.309—312.

② 《南非联邦统计50年：1910—1960》，南非调查与统计局1960年，第A—10页。

③ Holston, J.: "Space of Insurgent Citizenship". in J. Holston, & A. Appadurai, eds., *Cities and Citizenship*.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55—173.

④ Hindson D.C., *The Pass System and the Formation of an Urban African Proletariat in South Africa*, Johannesburg: Ravan Press, 1983, p.23.

⑤ Statistics South Africa, *South African Statistics 2015*(Johannesburg, 20016), pp.2+6—7.

城市,使得在这里擅自占地者人数比种族隔离时期还要多,还要密集。至今,它们仍高度隔离于有摩天大楼和高墙豪宅的北部白人区。实际上,发展未能解决种族隔离的长期影响,发展的重点是中心城区,而非“贫困区”所在的郊区。约堡仍然反映了种族隔离空间规划的遗产——富裕的白人家庭财富几乎是黑人中产阶级家庭的10倍。当下,即使黑人中产阶级呈爆炸式增长,黑人在以前白人郊区的存在仍然很少。^①

诚然,约堡包括在内但并非唯一在南非历史上的种族隔离式城市,它只是南非此类城市的代表之一,它只是在南非众多城市中较为浓墨重彩的那一笔。从某种程度说,南非历史也是南非城市的发展史,一座座代表性城市见证了南非历史的变迁,更见证了南非种族隔离这段独特历史。相比欧洲和亚洲,南非的城市是非常新的,它的城市轮廓在距今一个世纪前才被正式命名,开普敦虽开启了南非城市发展史之路,是“南非的城市之母”,但约堡才是南非近现代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更是南非种族隔离史的“亲历者”。至今仍显示出其种族隔离历史对城市结构的影响。特别是这种影响在他不规则发展中始终呈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由于试图解决与种族隔离结束时定义城市环境的深层社会空间划分相关的问题。结果是保持了强烈的两极分化,并巩固了非正式和隔离住区的存在。1994年后实施的以人为本或以扶贫方式为基础的社会政策几乎没有关注空间不平等,这也是由于公共决策者难以统一重建一个基于种族处于严重分裂的城市。约堡的城市系统的动态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地表达和反映了种族隔离城市历史的典型特征,如城市低收入居民的隔离模式和流离失所、空间边缘化和社会排斥。与此同时,进入全球市场导致失业、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加剧,社会仍在寻求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和包容之间的平衡。换句话说,最贫困阶层在市场上竞争的困难加剧了不平等,并剥夺了他们在几个主要方面的“城市权利”。如果没有包容性城市对其进行改造和缓释,这些人口注定要不断地失去平衡和位置,并被城市复兴和重建进程所遗忘。

总之,通过研究约堡城市发展史中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尤其是把长期的种族隔离制度对于城市发展产生的消极性影响作为问题聚焦,以便了解包容

^① Mbembe, A. & Nuttall, S. "Writing the World from an African Metropolis", *Public Culture*, vol.16(2004), pp.349—372.

性的城市文化对于一个大都会圈尤其是经历过种族隔离历史消极影响的大城市的重要意义以及对该种城市竞争力提升的作用和效能。

二、约堡城市“二元结构”成因、表现及影响

约堡北部白人富裕区历史溯源。据当地民间传说,约堡矿业公司董事莱昂内尔爵士的妻子弗洛伦斯·菲利普斯(Florence Phillips)看上了约堡北部一块地并建造了家园,将其命名为赫恩海姆(Hohenheim),德语意为“高处的家”。1893年3月10日被正式命名为帕克敦(Parktown),此后,该地吸引来了与矿业相关的白人富有企业家、金融等高级管理阶层来此地居住,如莱昂内尔·菲利普斯爵士(Sir Lionel Phillips),阿尔弗雷德·贝特(Alfred Beit),J·戴尔·莱斯上校(Col. J Dale Lace),托马斯·库里南爵士(Sir Thomas Cullinan)和珀西·菲茨帕特里克爵士(Sir Percy Fitzpatrick)。在维多利亚(the Victorian)时代和爱德华(the Edwardian)时代,这里不断建造很大的豪宅,有20多个房间,建造起来几乎不考虑费用。^①这些住户很多是被这里丰厚的薪水和舒适的生活条件所吸引来,其中许多是高素质的采矿专家,该地区逐渐成为“白人富裕之家”。在20世纪初的劳工斗争中,这里更被注入政治色彩,被视为资本主义和殖民价值观的“堡垒”。随着受物理环境以及社会偏好和经济可行性等因素的推动,约堡白人住宅区不断向北扩张,1893年的奥克兰公园(Auckland Park)和伯里亚(Berea),1894年的罗斯班克(Rosebank),1896年的奥克兰(Oaklands)和1902年的克雷霍尔(Craighall),到1910年,约堡的大部分北部郊区一直延伸到林登(Linden),伊洛沃(Illovo)和布莱姆雷(Bramley)等形成“片区”,尽管直到1930年才开始形成鲜明的白人特色。^②但实际上,它是约堡北部白人富裕区聚居点的历史开端。^③

约堡南部成为黑人贫困区的历史溯源。1936年至1946年间,约堡的黑人人口增长了59%,总数接近四十万。同期,白色人口的相对增长率为29%。

① Murray, M., "Timing the Disorderly City. The Spatial Landscape of Johannesburg after Aparthei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23—56.

② Hedrick-Wong Y, Angelopulo G, "The challenges of urbaniz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A tale of three cities", *Master Card Worldwide Insights*, vol.3.(2011), p.3.

③ Keith Beavon, *Johannesburg: The Making and Shaping of the City*, Pretoria: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Press, 2004, pp.73—78.

然而,到战争结束时,市政府只建造了 9 573 个低收入住房单元,并在男性单性宿舍中提供了 7 270 个床位。这意味着官方只有大约 55 000 人被安置在市政住宅中。^①当然实际人数比统计更多。大多数人被迫非法迁入奥兰多(Orlando),皮姆维尔(Pimville),杜贝(Dube),纽克莱尔(Newclare)和亚历山德拉(Alexandra)等地区的空地,并使用任何可用的材料搭建临时居住点。^②非正式定居点几乎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数以千计的粗麻布结构点缀在奥兰多和克里普维耶(Kripwier)之间的空地上,它们被称为“棚户区”。^③接下来的五年是约堡黑人住宅区历史上的重要时期。由于大多数白人劳动力从事海外战争任务,对当地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战争的持久性不仅推动了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而且其对物质生产的需求打破了许多关于使用黑人劳动力的旧禁令。结果,更多的黑人工人被带到城市,并使黑人构成发生了变化——儿童比例增加(超过 20%的人口是年幼的孩子),这表明黑人家庭倾向于切断他们的农村根源并在城市建立永久性家园。也标志着约堡城市黑人人口的经济和居住构成经历了最终的、不可逆转的变化。这种占屋运动被南非殖民政府视为一种蓄意的政治和抵抗策略,旨在迫使约堡市议会(Johannesburg City Council,简称 JCC)扩大其廉价房屋存量。再一次,市议会无法提供预算来扩大其住房计划并容纳这些居民。1944 年,该运动引起了媒体和其他具有同情心的非政府组织的关注,他们敦促市议会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最后,市议会做出了让步,开始在奥兰多西部的克里普维耶建造廉价房屋,当地人将其称为“Phomolong”,即“休息场所”。因此,约堡南部包括索韦托在内就慢慢变成黑人等有色人种的聚居区。^④

(一) 约堡城区南、北呈“二元结构”的成因探析

首先,白人殖民官员在历史上早已把约堡塑造为种族隔离城市,在他们思想深处,早已有分裂城市的雏形。实际上,不应脱离“当时盛行的白人观点”这

① 参见:大卫·古德休,《体面与反抗:索菲亚镇的历史》(David Goodhew, *Respectability and Resistance: A History of Sophiatown*),普雷格出版社 2004 年,第 140—146 页。

② Philip Bonner, Peter Delius, Deboral Posel, eds., *Apartheid's Genesis, 1935—1962*, Johannesburg: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300—318.

③ Pauline Morris, *A History of Black Housing in South Africa*,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n Foundation, 1981, pp.16—18.

④ Keith Beavon, *Johannesburg: The Making and Shaping of the City*, Pretoria: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Press, 2004, pp.72—76.

—特定历史时刻来理解这一思想。早在1950年4月,原住民事务部长詹森(EG Jansen)博士在议会表示,“认为应该为刚刚脱离原始条件的原住民^①提供一栋对他来说类似于宫殿的房屋和便利的设施是错误的观念,他无法赞同,而且在未来许多年里他都不会欣赏”。^②后来成为南非联邦总督的詹森无疑得到了他的领导人、总理丹尼尔·马兰(Daniel Malan)的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土著(指黑人)不需要家,他们可以睡在树下”,实际上他的观点是对其前任此观点的一种“传承”或呼应。^③在1894年,在弗雷德多普(Vrededorp)的规划阶段,弗雷德多普是一个经济条件较差的郊区,旨在为贫困的荷兰人以及附近马来地区的居民提供住房。但时任总统保罗·克鲁格(Paul Kruger)却不断削减地块面积,据说最后已将地块面积削减至250平方英尺,并声称“我不会给他们农场,只会给他们坐的地方”^④。这从思想深处为南部城市建设尤其是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作为埋下伏笔。

其次,虽然官方层面的种族隔离制度早已在1994年被废除,但种族隔离历史的无形影响仍然深深地铭刻在约堡的城市结构中。它们的影响可能会在未来很多年内继续被感知到,它们的痕迹可能永远不会从南非的城市肌理中完全消失,并且将持续隔离这座城市。这里用一个隐喻来说明此问题:种族隔离制度的大厦只有通过起相互支持的法律、政令、政策等脚手架才能完全建成;一旦建筑物完工并且可以独立站立且不会倒塌,那么脚手架就失去效能可以被拆除。诚然,在1990年2月2日之后,国民党政府开始不遗余力地取消其种族隔离的法律支持,但从该制度继承下来的经济不平等的实质结构在约堡城市的结构中仍然存在。它像一块病毒一样牢牢被切入到城市的肌理当中,持续性地对城市施加病变——将城市一分为二的隔离,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进行“破坏”。^⑤

然后,约堡南部黑人贫困区的诞生要归功于其他黑人居住区被有意破坏,例如西部原住民城镇、东部原住民城镇、索菲亚敦(Sophiatown)和莫罗卡

① 指黑人。

② A.W. Stadler, “Birds in the cornfield: squatter movements in Johannesburg, 1944—1947”,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1(1979), p.32.

③④ Susan Parnell, “Race, Power and Urban Control: Johannesburg's Inner City Slum-yards, 1910—1923”,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3.(2003), p.23.

⑤ 参见:凯斯·贝文:《约翰内斯堡:城市的产生与发展》(Keith Beavon, *Johannesburg: The Making and Shaping of the City*),南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5—77页。

(Moroka)等非正式临时居住点。其中每一个,在各自的时代,都代表了对白人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抵抗。反过来,每一个也都被政府官僚机构有意摧毁之。政府官僚机构一意孤行,系统地破坏临时居住地的社会结构和民主政治运动。^①因此,重新安置被当作政治武器来使用,故意驱散稳固的邻里单位和支持团体,将大家庭和邻居分开,最大限度地增加迁移和剥夺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手段。使得索韦托等约堡南区最终成为其他区黑人迁移的目的地,不可避免成为了种族隔离历史的副产品。

第四,当时南非联邦政府痴迷于实施单独的“家园”发展政策,试图分散工业并将城市地区的所有黑人居民转移到一系列固定“边缘区”。其目的是让所有城市黑人成为“临时居民”,并在一个或另一个阶段,在征得或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将他们重新安置到一个“种族”预定的城市偏远地区。他们的“临时”身份使他们的住房需求处于次要地位,政府用于建造新房的资金只提供给那些自愿离开市区的人。据记载,该计划适合一些希望退休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但据了解,很少有人利用了这一机会。^②由于所有城市黑人都被视为“临时”居民,因此不受理或者直接拒绝在黑人指定郊区建造私人住房的申请,这实际上相当于将黑人牢牢“捆绑”在政府指定的区域进行居住和生活,即约堡南区。

最后,约堡黑人住宅区的开发主要发生在城区以南。造成这种情况的最初原因似乎不是深思熟虑的政策决定的结果,而是一系列历史和地理巧合的结果。例如,布拉姆弗泰恩(Braamfontein)山脊以南的地区一直被认为寒冷多风,容易出现龙卷风、逆温、猛烈的雷阵雨和冰雹,甚至还有导致墙壁开裂的地震;因此比起其北部的土地更不适合居住。^③另一面,采矿工业带的发展及其产生的粉尘污染、水污染加剧了南部这种情况。克利普斯普雷特(Klipspruit)就建在污水处理厂所在地,且远离城镇,多年来交通不便;^④而索韦托则建在

① 参见:大卫·古德休:《体面与反抗:索非亚镇的历史》(David Goodhew, *Respectability and Resistance: A History of Sophiatown*), 普雷格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0—146 页。

② Philip Bonner, Peter Delius and Deborah Posel ed., *Apartheid's Genesis 1935—1962*, Johannesburg: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32—36.

③ Philip Bonner and Noor Nieftagodien, *Alexandra: A History*, Johannesburg: Wit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44.

④ Philip Bonner and Noor Nieftagodien, *Alexandra: A History*, Johannesburg: Wit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45—47.

垃圾场结构不稳固的土壤上,土地被用来堆放黏土,因此建造起来很昂贵,直到1951年才提供少量正规住房,^①等等。到1931年,南郊的居民仅占约堡白人人口的14.9%。直到1960年代,这个数字相对于大都市城区和北区白人人口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当时南部区域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黑人大规模迁入,这种快速增长从根本上改变了比率,使得白人比率继续下降。^②总之,鉴于当时大多数人的种族隔离主义心态——该镇的南部地区偏远且不如北部地区舒适——成为了联邦政府默认的一个黑人居住地。

上述是从各个角度造成约堡逐渐沦为种族割裂城市的原因,但不限于这些。

(二) 约堡呈“二元结构”的表现

约堡城市界限的隔离感、城市空间的差异性是否能代表南非主要城市看似不可读、混乱、难以理解和治理的特征。研究约堡城市景观的表层(例如,城市空间、结构、布局的转变)与植根于当地历史和记忆的深层结构形式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一定程度能够窥测出约堡城市畸形发展的一些具体表现。^③换句话说,在南非大城市尤其是像在约堡这样的大都会圈内,差异性或者是割裂感显而易见,即在其中既存在白人精英集中居住的中央商务区(CBD)、内城和桑托(Sandton)等中北部富裕城区,又有新迁移发展的城市居住点、黑人贫困者聚居的索韦托等南部落后城镇以及被贫困笼罩的约堡西区,其中在黑人聚居区——索韦托(Soweto)——甚至被有些学者戏称为“黑人贫民窟”。^④正如默里所认为的那样,“种族隔离之后的约堡是一座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没有支配性的市中心或容易辨别的边界。它的城市空间扩张几乎没有限制,它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支离破碎的大都市,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一个不连贯的群岛,由孤立的、强化的飞地组成,不均匀地分布在广阔而高度分化的领土范围内”。^⑤

① Stephen Shisizwe Hlophe, “Power and Status in Soweto: An African Urban Community Undergoing Industrialization,” Ph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1979, pp.21—23.

② 德波拉赫·铂瑟尔:《种族隔离的形成(1948—1961):矛盾与妥协》,第39—41页。

③ Mbembe, A., & Nuttall, S., “Introduction: Afropolis,” in S. Nuttall, & A. Mbembe, eds., *Johannesburg: The Elusive Metropoli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33.

④ Philip Bonner and Lauren Segal, *Soweto: A History*, Cape Town: Maskew Miller Longman, 1998; Philip Bonner and Noor Nieftagodien, *Alexandra: A History*, Johannesburg: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⑤ Edith Hofer, Walter Musakwa, Sander van Lanen, Trynos Gumbo, Stefan Netsch and Katharina Gugerell, “Inclusive Insights: Two urban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Johannesburg”, *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vol.18.(2022), p.38.

默里(Murray)认知中的约堡似乎很庞大,很破碎,然而从更宏大、更全面的社会视角来看,约堡似乎被一分为二——一座为贫困之城和一座为富裕之城。因为其城市会明显呈现出种族隔离历史造成的隔离感和阶级分化的痕迹,这种痕迹呈现向两种极端方向发展,且愈演愈烈。实际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痕迹表现在多种方面。

首先,从城市的空间布局就能窥见一二。从空中俯瞰,约堡好像被劈为两半,城市南北分界线清晰可见,高耸林立的摩天大楼与密密麻麻的锡皮小屋,仅一路之隔或一河之隔,对比鲜明而又刺目。这种造成城市空间割裂、错位的畸形状态固然有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过程的通病,固然有现代化发展道路上所必须经历的“阵痛”,^①但对比如此明显醒目,尤其是黑人和白人、有色和无色人、富人和穷人,居住范围如此界限分明绝非单单经济发展或者城市化发展所导致的这么简单,从历史源头来说是种族隔离历史对城市打下的深深烙印,这个烙印再叠加城市化发展更加剧了这一裂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只是加深或加剧了这一城市空间布局,而非历史源头。

其次,从城市空间结构也能看到种族隔离历史对城市的影响。索韦托、约堡西区或者城市外围新发展临时居住点等南部“贫困区”尽管通过 20 多年公共投资,其城市发展得到一定改善,但这里仍然面临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问题,它们缺乏对城市内部诸如工业区、居住区、商业区、行政区、文化区、旅游区和绿化区等作明确分区,各个功能区或完全没有或功能丧失。^②实际上,根据联合国的发展研究报告,在城市结构的诸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工业区、居住区和商业区。一般说来,工业区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城市内部空间布局的主导因素;居住区是城市居民生活和社交文化活动的地方;商业区是城市各种经济活动特别是商品流通和金融流通的中枢。^③相对南非中、北部发达地区在空间布局上具有明显的功能分布,且各个功能区排列有序甚至鳞次栉比,索韦托、西区等贫困区所谓的各种功能区往往交叉和混杂在一起,呈现一堆“乱麻”。^④如在

① United Nations, *World Social Situation 2019: Shaping the Future of Inequality*,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9, p.34.

② S.M. Parnell, “Johannesburg Slums and Racial Segregation in South African Cities, 1910 —1937,”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1993, pp.34—39.

③ United Nations, *World Social Situation 2019: Shaping the Future of Inequality*,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20.

④ 参见:T.R.H. 达文波特:《南非城市隔离的起源:1923年土著(城市地区)法及其背景》,第4—7页。

居住区内往往有一些对居民生活影响不大或无污染的工业企业,也有一些非正规的零碎型商业体、服务机构;而在工业区也常常有一些住宅和公共服务设施存在等。

第三,种族隔离历史对城市的影响还表现在结构单一问题上。贫困区由于历史上是由黑人金矿工临时居住地发展而来,所以城市结构存在明显单一问题,即整个城区主要以低级居住区为主,缺乏其他相配套的功能区,如正规工业区、较大型商业区、文化区、绿化区甚至休闲旅游区等。只是在居住区内部混杂有非正式经济存在,如类似中国的“小卖部”“摆地摊”或者其他临时性质的服务。这些非正式城市区是非正式经济下的产物,能部分弥补正规城市功能区的部分作用,但远非全部。对于更奢侈的绿化区、文旅区等更是天方夜谭。结构单一事实上间接性地降低了黑人等贫困者的生活质量。实际上,在新南非建立之前,非正式经济由于受到白人统治当局的各种限制,使得“贫困区”等城区结构单一问题处于无法解决的状态,由于服务设施的不健全,黑人生活质量更加低下。随着南非新政府的建立,非正式经济被更多认可和包容,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里的结构单一问题,同时也改善了穷苦黑人的生活质量,但此并非长久之计。^①

第四,实际上房屋建筑材料上的差异也能反映种族隔离的“二元式”割裂感。像约堡的中央商务区,和其他区尤其是索韦托、约堡西区等相比,建筑材料明显更加高级,也更加昂贵。在索韦托有大量类似临时搭建的简陋棚屋,建造上主要使用一些不耐用的材料,甚至达不到国际最低标准。^②大多数建筑都是隔开的小房间,大多家庭全家挤在一起,房子构造非常简易,建筑材料上有些使用不规则石块,有些使用黏土墙和波纹铁皮屋顶作材料,有些使用石棉瓦围成简易小屋,有些使用锡制材料,稍好的一些使用破旧的彩钢进行搭建,其他住所使用碎木板和金属板建造没有空气的小屋。屋内基本上没有或很少使用地板砖,绝大多数是泥土地面。^③总之,这里缺乏更结实的钢筋水泥浇灌的

①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Loba Future Cities Programme Johannesburg City Context Report, United Kingdom, United Kingdom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2018, pp.9—13.

② Magubane, Peter, *Soweto: The Fruit of Fear*, Africa World Press, 1986, p.74. 参见:李哲:《1652年以来的南非城市与建筑初探》,清华大学建筑系硕士毕业论文,2004年版,第75—77页。

③ Crankshaw O., Hart T., “The roots of homelessness: causes of squatting in the Vlaktefontein settlement south of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n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72(1991), pp.65—70.

中级或更高级的住房。这和约堡北部“富裕”城区房屋的建筑材料完全不一，它里面的建筑统一使用符合世界标准的钢结构、钢管混凝土、型钢混凝土等现代化材料。设计上也和欧美发达国家的房屋别无二致。^①

最后，在生活服务设施上割裂感更加明显。主要表现在供水、厕所、道路、医疗、学校等几个方面上。这里以供水和道路为例。首先是供水问题，自来水管道和污水管道连接在较富裕的北部、中部地区，这些地区往往有多个现代化的水龙头，且安装在卫生间等室内，有些与现代饮水机直接相连接。^②而与之形成隔离的是，索韦托、约堡西区、南区或者城市郊区临时居住点，这里很多没有铺设供应自来水的管道，只是在特定时刻、特定地点有有限的水罐车来此地供水。有的条件稍好的社区仅仅有一个公共水龙头存在。^③同时还有一部分人依赖河流和小溪水，甚至部分社区需要从中介机构购买价格不菲的饮用水。^④其次道路问题，富裕白人区道路宽敞，笔直，四通八达，有种条条道路通罗马的感觉，而且是柏油路和硬质水泥路，常修且常新。^⑤而反观黑人等贫困区道路陈旧且较窄，这直接导致了道路在使用过程中密度较高。其次，步行道缺乏或很不完善，这使得主干道会集了行人、摩托车、汽车，甚至牛车、马等，使得道路通过率被极具降低。高速道路和大桥等跨越自然障碍的物理设施缺乏，铁路线也不够密集，尤其是与外界联系上缺乏地区之间的相互贯通性。^⑥

（三）约堡呈“二元结构”的影响

从宏观角度，约堡受到种族隔离政策的历史影响，不断将一个劣势叠加到另一个劣势上，直到他们在富裕的北部郊区和贫穷的南部郊区之间造成事实上的鸿沟，这种鸿沟一直持续到今天。单独看，负面因素似乎不多；但综合来

① 参见：李哲：《1652年以来的南非城市与建筑初探》，清华大学建筑系硕士毕业论文，2004年版，第70—74页。

② George Charles Angelopulo: "A comparative measure of inclusive urbanisation in the cities of Africa", *Southern Africa Strategic Review*, vol.39, no.1 (Jun 2021), pp.1—10.

③ Nomavenda Mathiane, *Truths of Soweto Life*, Johannesburg: Southern Book publishers Ltd, 1990, p.25.

④ Kourtit, K., Nijkamp, P., & Stough, R.R. "Introduction". In *The Rise of the City*.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5. Retrieved Apr. 17, 2023, from <https://www.elgaronline.com/view/edcoll/978178347555353/97817834753>.

⑤ 参见：李哲：《1652年以来的南非城市与建筑初探》，清华大学建筑系硕士毕业论文，2004年版，第43页。

⑥ Tomlinson, R., *Urbanization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London: Unwin Hyman, 1990.

看,白人政府对黑人施加了贫困落后的诅咒性政策——事实上造成了巨大割裂。

首先,从城市横向来说,南北造成了巨大的裂痕并且这个裂痕在不断扩大。从约堡北部来说,它们从帕克敦(Parktown)和霍顿(Houghton)向南延伸,一直延伸到北部的梅尔罗斯(Melrose),邓凯尔德(Dunkeld),海德公园(Hyde Park),桑德赫斯特(Sandhurst)和桑顿(Sandown)。这里从1950年起,就进行“奢侈式”的住宅开发,其中大部分建筑面积在4 000平方米或以上。到1960年,这些地区已经得到再一次更新基础设施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并且允许开发更高级别的住宅,每个豪华住宅的面积在1 000平方米到2 000平方米之间。^①

而约堡南部,伤痕累累的临时窝棚在没有规划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破旧的建筑、人口密集的老旧街区以及密密麻麻的铁皮小屋杂乱地布满在土地的各个角落。^②通往索韦托的车辆通道过去和现在都仅限于三大主干道和一条小碎石路。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内乱期间限制进出该地区。^③索韦托的许多较旧的郊区,如奥兰多东和梅多兰兹,都是以“蜂窝”模式布局的。^④大多数开放空间,在城市规划地图上被指定为“绿色”区域,只不过是政府给公共服务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在接下来的40年里,几乎在每一个实际位置,这些开阔的未开发土地,被用作汽车残骸的倾倒场和流浪者与犯罪团伙的避风港。

其次,从历史纵向来看,这一消极影响给当下的约堡带来了深刻的发展瓶颈。约堡被一分为二,纪念性建筑和贫民窟林立,社会两极分化极为明显,富裕的精英与极度贫困者共存——在物理上被明显分开。约堡这座城市既表达着进步的理想之光,也同时表达着边缘现实的阵痛,集体记忆与故意失忆交替出现。持续不断的城市隔离在形态上影响着这个不断扩张的城市,并影响着其人口分布,通过反映种族隔离城市提供的多种体验、生活方式和活动的有计划和无意识的行动,从中衍生出来的意象——既像是“非洲的纽约(New York)”又像是“非洲的奥兰吉镇(Orangi Town)”^⑤——显示出重塑自我和割

① Deborah Posel, *The Making of Apartheid 1948—1961 Conflict and Compromi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54—100.

② Kuznets, Simon,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45, no.1(1955), p.8.

③ Mandy, Nigel, *A City Divided: Johannesburg and Soweto*, St. Martin's Press, 1984. p.45.

④ Mandy, Nigel, *A City Divided: Johannesburg and Soweto*, St. Martin's Press, 1984. p.42.

⑤ 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位于南亚次大陆——巴基斯坦。

舍不断的矛盾心理,所揭示的是一段尚未找到与过去历史和解的动荡场景。^①因此,由此产生的图像是一个棱镜,一方面反映了正在重塑城市建筑环境、规划和城市文化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不平等的持续存在、贫富的巨大分化和居民城市权利的缺失。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引发了一场关于包容性城市发展的广泛辩论,旨在重塑城市景观,以实现种族和解。然而,缺乏适当的住房和社会保障政策,以及严重的不平等和仍然占主导的非正规经济,越来越多亟需包容性城市理念和公平城市空间方略去找寻答案。

三、包容性文化对种族隔离城市呈“二元结构”的缓释效能

包容性城市文化要求公平地享用城市空间资源,消除城市空间中的隔离、排斥(尤其是种族隔离性质的排斥),允许城市所有人能够获得城市权利和具有平等发展机会,实现城市中的空间正义。从南非约堡视角来说,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角度,都具有自身独特的城市历史和城市特征——种族隔离历史使得城市呈现“二元结构”且这种程度在不断加深。本来历史上的利益受损者——绝大部分黑人和少部分白人贫苦者,他们理应享有获得市场和资源的机会平等,生活水平要有明显提高,城市空间尤其是城市资源要对他们或与他们相关的企业平等开放,要建构公正的监管环境,提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鼓励良性竞争等。^②实际上,这都离不开约堡对旧“二元结构”历史的消弭,以创建一个拥有更公平的、种族更融合的城市。让空间正义、城市发展、资源共享惠及城市中的每一个居民身上,特别是“二元结构”的利益受损者身上。最终,让包容性文化提高城市凝聚力,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逐渐开始了解和尊重彼此的文化差异,促进城市全体居民共同发展。让城市更宜居,更具有包容性,更适合包括所有收入水平的居民去居住。

(一) 新南非诞生以来约堡城市“二元结构”发生的新变化

实际上,自1994年新南非建立以来,虽然民主和解政府致力于从各方面抹去种族隔离历史的烙印,其中包括约堡城市的“二元结构”问题。但似乎这个城市今天仍然有“二元结构”的影子,只是造成“二元结构”问题的主因发生了“位

① S.M. Parnell, "Johannesburg Slums and Racial Segregation in South African Cities, 1910—1937",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13(2018), pp.81—83.

② 孟瑞霞:《城市正义与人的发展》,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版,第50+66—76页。

移”——由种族隔离制度转移到了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的资本主义盲目性上。

今天的约堡不但受种族隔离历史“遗毒”的影响,而且有基于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城市政策所加剧的城市阶层“二元结构分化”的新情况、新问题。虽然种族隔离历史遗毒对于城市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消散,但是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城市却仍旧将城市“二元结构”的裂痕加大而非缩小。狂热的资本主义使得约堡的整个城市资源被重新分配,包括将城市空间、资源和货币从普通城市阶层割让给权贵和富裕阶层。^①因此今日新南非下的约堡“二元结构化”仍然不容乐观,有种“按住葫芦浮起瓢”的无力感。虽然包容性的和解政府上台使得种族隔离历史被慢慢消减,但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却仍然横行于城市当中。故“二元结构”仍然在城市中维持,只是可能发生小范围或者小部分人口的角色转换——小部分黑人居民成为富裕者挤进了“富人俱乐部”,而部分白人城市居民成为贫困者,跌落到贫民窟当中。位于约堡近郊克鲁格斯多加冕公园(Coronation Park)^②的南非最大白人贫民窟的“诞生”或许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③

约堡这一“世界级的非洲城市”(a world-class African city),由于种族隔离的历史渊源所呈现出的“二元结构”,实际上引起了全球范围内许多大城市的共鸣。世界上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大城市诸如纽约(New York),圣保罗(Sao Paulo),墨西哥城(Mexico City),新德里(New Delhi),雅加达(Jakarta),拉各斯(Lagos)和开罗(Cairo)也正朝着约堡的城市“二元结构”方向“发展”,只是约堡等南非大都市由于受种族隔离制度的巨大历史负遗产,使其呈现的“空间不平等”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而已。^④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城

① Melissa Tandiwe Myambo, *Reversing Urban Inequality in Johannesburg*, Routledge Contemporary South Africa Press, 2019, pp.3—15.

② 这座公园是南非著名的白人贫民窟,里面住着数以万计荷兰血统的白人。每个人每月仅靠着政府的低保,大约 28.99 镑(约 260 人民币)赖以生存。它由来已久,当年是白人的专属休闲场地,严格禁止黑人踏入,现在又成了白人的家园。很多白人拖家带口来到这里,扎上帐篷或住进棚屋,曾经白人的休闲之地变成了现在的贫民窟。这里没水没电环境脏乱差,匮乏的基础设施,事实上完全满足不了这么多人生活。以前黑人被禁止进入,现在黑人则不愿意进入,已经过上好日子的黑人,逐渐忍受不了这里的恶劣环境儿选择搬走。

③ 钱芳华:《浅析南非后种族隔离时期白人贫民窟的形成》,《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237—238 页。

④ Melissa Tandiwe Myambo, *Reversing Urban Inequality in Johannesburg*, Routledge Contemporary South Africa Press, 2019, pp.3—9.

市,带来的赢者通吃法则,最终的结果就是城市呈现不平等,且这种不平等的裂痕会不断扩大。这种裂痕或者说割裂感最终到一定程度就呈现出“二元结构”——一种同时产生财富和贫困的城市经济体系——富人区对低收入城市居民的欢迎程度、可达性和友好性会持续不断降低,而贫困区会不断扩大,膨胀,并且与城市主流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穷和富二者相互向各自方向集聚,呈现出“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的极端状态。实际上,这种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城市化产生的推力使得城市的空间动态正在加剧而不是减弱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化,加之叠加种族隔离历史的约堡使得“二元结构”更显深刻性。这意味着或许在 21 世纪,世界各地的大城市都表现出日益加剧的空间不平等,表现为富裕、享有特权的城市核心地带被远离城市资源和基础设施缺乏的低收入者所包围,而其中的南非约堡是这个全球城市发展趋势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实际上,我们知道新南非以来,约堡城市“二元结构”的发展大趋势没有变化。变化的或许只是造成这种“二元结构”的因素而已。就像 2013 年,当时负责国家计划委员会(NPC)的部长特雷弗·曼怒埃尔(Trevor Manuel)在比勒陀利亚举行的政府领导人峰会上与记者讨论一些国家问题时,被引述说:“我们不应该再说这是种族隔离的错,在 1994 年、1995 年和 1996 年,政府可能会说我们没有经验,但随着国家接近几十年的民主,这不再是一个借口了。”这是一种观点——种族隔离历史虽然还对城市有影响,但是影响越来越弱,而这座城市所呈现的“二元结构”仍然严重的罪魁祸首是新自由主义指导下造成的“狂热”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贫富差距,种族隔离历史反而退居为次。而前总统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却呈现出另外一种观点,用一家媒体援引他的话来说:“虽然我们希望看到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发生迅速的变化,但我们并不幻想南非会在短短 20 年内自动地全面地发生变化,这是不可能的。种族隔离制度的遗产太深,太久远,民主政府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扭转它。”这是另一种观点——种族隔离历史仍然较为深刻地影响着约堡这座城市,这座城市所呈现的“二元结构”的罪魁祸首仍然是种族隔离历史。非国大当时最有权力的两位人物采取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从更深远的角度来看,反映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复杂性。^①

^① Ndangwa Noyoo, *Social Policy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Social Re-engineering for Inclusive Development*, Routledge Contemporary South Africa Press, 2020, pp.11—17.

总之,两位领导人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南非成立以来,造成约堡“二元结构”的动因所呈现出的一种新变化。也同时是约堡“二元结构”可能未来发展的一个新趋向。另外,这两种认识也代表了现阶段约堡城市公民的两种主要观点——来自一些方面的城市公民认为,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自由和民主和解政府之后,把这个国家的所有发展缺陷都归咎于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时代的时代的历史影响必须结束——这与曼怒埃尔的观点似乎略有呼应。另一方面是类似祖马的观点,认为几百年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影响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的自由和民主中被根除。^①迄今为止,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持续影响着关于约堡城市包容性文化对城市的“二元结构”改造和缓释问题。

实际上殊途同归,不管新南非以来,约堡所呈现出的“二元结构”城市问题的主因仍然是种族隔离历史,还是已转化为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狂热的资本主义盲目性。但对于包容性的城市文化缓释约堡城市“二元结构”化问题都是必不可少的。或者说是当下比较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迄今为止,虽然约堡城市“二元结构”仍然存在,这个大趋势没有改变,但一些细微的变化实际上正在发生,可能完全改变这个过程需要非常漫长,或者结果可能永远无法改变。

(二) 包容性文化对约堡城市“二元结构”改变的路径和方式

虽然自1994年新南非建立以来,政府在解决“二元结构”割裂方面一直在努力,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比如政府利用财政政策来支持财富再分配,利用公共资金进行杠杆化运作——政府在教育、医疗服务、社会发展(包括对弱势家庭和个人的社会援助)以及社会保障、公共交通、住房和当地便利设施等方面对约堡城市弱势一方进行倾斜式投资。这种再分配性质的投资,在政府减少贫困和不平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这些努力最早可追溯到1993年的重建和发展计划,这是后种族隔离时代的第一个“处方”。尽管如此,据报告显示约堡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城市之一,消费不平等自1994年以来一直在加剧,财富不平等程度也很高,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程度还在加剧。两极分化的劳动力市场导致了高度的工资不平等。代际流动性相对较低,成为消减或缓释“二元结构”的一大障碍。^②

① Ndangwa Noyoo, *Social Policy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Social Re-engineering for Inclusive Development*, Routledge Contemporary South Africa Press, 2020, pp.12—15.

② Overcoming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South Africa; “An Assessment of Drivers, Constraints and Opportunities”, March 2018, household budgets as a social indicator of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south africa-(docin.com).

对此,久居南非的赞比亚裔学者恩丹格瓦浓约(Ndangwa Noyoo)以一种局外人的视角对南非进行了批判:“新南非被非国大领导下的三方联盟塑造过的城市当中,所依赖和使用的大多数工具不仅生硬,而且本身就是从殖民一种族隔离秩序中继承下来的。因此,如果约堡想要从隔离城市转型为一个包容性的城市,需要引入新的、尖锐的工具和思想来为此城市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①这种主张建立一种新的、完全不同的社会政策,对约堡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造和重组,使得城市从根基上面进行再改造和再转型。事实上恩丹格瓦的观点似乎借鉴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思想内核,即新城市似乎会继承旧城市的缺陷、落后、弱点和繁重的历史包袱,对于这种“不得不”的继承,有必要“彻底删除旧的经济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人民的生活,改变维持此城市的经济基石。当然说起来永远比做起来难,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使用激进主义式的方法完全改变几乎是不太可能。^②

事实上,通过包容性文化来软性调整或许更具有现实可能性。一方面,联合国人居署在包容性文化对包括约堡城市在内的“二元结构”缓释方面给出的路径或许可以借鉴。它发起了“倡导全球积极城市变革运动”和“新城市范式”两种模式来缓释城市“二元结构”问题。前者源于对当前“关键的城市发展趋势导致隔离、不平等和环境退化加剧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将缓释城市问题拨到全球优先解决的议程当中”。后者倡导塑造一个社会包容性高、规划良好、交通便利、经济充满活力尤其是在公平公正包容性方面非常良好的一个城市。另一方面,约堡市政府自己也在寻求路径以便突破。为此制定了一个名为“包容性约堡”的计划,旨在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和平等的城市。这个计划的目标是在城市中推广包容性文化,促进不同人群之前的交流和互动,增加社会凝聚力。为此,约堡市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例如推广多元文化、增加对历史事件的理解、提高社区参与度等。

对于上述的宏观规划,事实上约堡市政府还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以便更好落实。包括推广平等教育、保护少数族裔的权益、支持性别平等、提高难民和移民的融入程度、鼓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合作创业、创新

① Ndangwa Noyoo, *Social Policy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Social Re-engineering for Inclusive Development*, Routledge Contemporary South Africa Press, 2020, p.2.

② Ndangwa Noyoo, *Social Policy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Social Re-engineering for Inclusive Development*, Routledge Contemporary South Africa Press, 2020, pp.3—4.

和创造等。^①这些政策和措施旨在打破历史上的种族隔离,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和平等的城市环境。其中尤以约堡市政部门在2013年就已规划的“自由走廊”计划最具特色。

这一走廊是基于以交通为导向的发展理念,沿着某些走廊部署快速公交系统(BRT),在这些走廊周围建造混合用途、高密度的枢纽,使得整个城市空间更加紧凑,从而更有效地利用城市空间,为城市包容性打好物质基础。这里以南非约堡富裕区中的诺伍德(Norwood)居民对高密度住房被引入他们豪华社区的感受为例。在大都市的战略走廊上刺激混合用途的经济活动,这个项目以“重建”城市为语言表达,将从根本上改变城市居民的生活——尤其是城市中那些没有被眷顾的穷人。这些以交通便利为导向的自由走廊,将给贫民窟的居民更多的“平等”——包括经济和行动上的平等——将他们从破烂的非正式定居点,落后的学校教育以及有限的娱乐空间为特征的种族隔离空间遗产中解放出来。最初在城市中确立了建设两条走廊,后来增加到了四条,旨在改善贫民窟居民与繁华的工作地之间的联系。将种族隔离时期的政策和法律所塑造出的约堡不平等城市空间打破,从而改善这个城市中最贫困地区人上下班所花费的时间成本。例如将“黑人城市”索韦托(Soweto)和亚历山德拉镇(Alexandra),工人阶级所聚焦的特尔方丹郊区(Turffontein)与内城(Inner city)和桑德顿(Sandton)(约翰内斯堡的主要商业区)通过便利BRT有效地连接起来。除此以外,还寻求使战略区域更加密集的方案——建立模范(或者说试点区域)区域,使约堡贫困居民能够不需要将成本都放在路程上或者将不成比例的微薄收入都花销在住房上。使得他们能够在自己的社区就可进行工作、生活、学习和娱乐等日常活动。^②

总之,这种通过快速公交BRT的方式,试图将城市贫民窟和富裕的工作区之间建立紧密联系,从而尝试打破这种“二元结构”化的城市空间,塑造一种全新的更加包容性的城市空间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

当然,上述联合国和约堡市政当局的方式方法或许能在一定程度或一段时间内起到缓释效果。但问题是如果想长期进行改变,还需要更多包容性

① Melissa Tandiwe Myambo, *Reversing Urban Inequality in Johannesburg*, Routledge Contemporary South Africa Press, 2019, p.18.

② Melissa Tandiwe Myambo, *Reversing Urban Inequality in Johannesburg*, Routledge Contemporary South Africa Press, 2019, pp.9—23.

方面的智慧。从唯物史观视角,或许能找寻更多包容性方法——包容性地改变经济基础。因为南非的经济基础继续再现殖民和种族隔离的社会和经济结果——迄今为止,这种结果并没有被根本改变。种族隔离的经济基础所支撑的目标是使城市的某一部分群体处于极端软弱和脆弱的地位,同时支持另一部分达到富裕和特权的水平。种族隔离的城市政策和立法都旨在侵蚀约堡城市社会的一部分,使其永远为某些人少数人而得利,并永续下去。例如在约堡城市中,种族隔离制度的负面后果不仅仅是白人占据更好的住房和更多的收入,而似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被精心概念化的从经济基础角度进行残酷地固化。这意味着,在殖民和种族隔离的时代,大量的规划、思考、激情和智力资本被投入到这个社会大工程中。尽管非国大和约堡市政当局在新南非中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以消除种族隔离对城市的伤害,但很多行动似乎都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因为市政当局改变约堡的政策和计划都源自非种族隔离的“正常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些社会没有经历过 350 多年来被种族隔离所摧残下的历史。简单来说,经历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和种族隔离历史的城市理应有一个同样强有力且集中的一次社会改造的事业。有必要对政策进行反思,并制定一个相对更包容性的城市规划议程,即由一个强大的政府主导下进行系统性干预,这或许能够从根本上消除南非种族隔离对城市的消弭。^①

因为新南非依靠实行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城市经济政策来纠正南非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下几个世纪的积弊,无疑是处于矛盾之中,因为这样的城市政策不可能通过“涓滴效应”惠及城市中所有居民尤其是那些处于“二元结构”城市中相对不利的一方。例如,新南非在宪法中一直强调每个人都有适当住房的权利,并身体力行从 2011 年始,规划了为约堡低收入家庭建造数百万套政府补贴的住房计划。但是令人诧异的是,这些住房位于约堡城市的南北边缘位置,远离工作机会和生活设施服务相对集聚的桑托、内城和 CBD,这实质上强化了“二元结构”的城市空间模式。^②

因此,笔者认为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新南非民主化后,约堡仍然被前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政权的意识形态所影响的经济基础几乎没有变化。社会改造或

^① Ndangwa Noyoo, *Social Policy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Social Re-engineering for Inclusive Development*, Routledge Contemporary South Africa Press, 2020, pp.7—11.

^② Ndangwa Noyoo, *Social Policy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Social Re-engineering for Inclusive Development*, Routledge Contemporary South Africa Press, 2020, pp.8—13.

转型不能与当前的经济基础相一致,它必须被改变。南非只有为约堡追寻一个更加强大的干预主义的社会和经济改造计划,要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形成鲜明的对比。实际上,种族隔离、不平等和资本主义是具有复杂的内生性的联系,因此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来创造一个更加公平、更可接受的城市体系和城市结构。^①通过将城市包容性文化作为一种合适解决办法的文化内核,将社会政策作为一种关键性工具,依靠精心设计的工具和制定强有力的公共政策——这种新的公共政策应该超越其前人的成果和行动,重新调整从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中继承下来的排他性断层线。从而从根本上重新配置和调整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以产生一个深刻而全面的突破。总之,只有国家政权能够一心一意为约堡城市的穷人和边缘化群体撑腰,这个城市日益“二元化”的不平等裂痕或许才能被弥补。

结 语

约堡城市“二元结构”是资本主义贪婪性和 20 世纪种族主义恶劣思想叠加影响下的“一块伤疤”。在其形成近 150 年后,这座庞大的都市仍因其历史的罪恶而“伤痕累累”。当下,该城市是南非严重不平等的发源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种族隔离历史的遗留问题叠加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资本主义盲目性造成的。很明显,虽然官方层面的有形制度早已在 1994 年被废除,但种族隔离历史的无形影响仍然深深地铭刻在约堡的城市结构中。它们的影响很可能在未来很多年后继续被感知到,它们的痕迹可能永远不会从南非的城市肌理中完全消失。如果机会平等、空间正义、自由市场等可持续性的城市发展理念不太可能实现,那么这将不会是一座完整意义上的城市。^②虽然按照现在的发展情况,约堡仍然具有优势,但长期来说,它或许将经历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社会弊病的打击。因此,亟需包容性城市文化因子作为内核,驱动强大的民主干预主义价值观、社区赋权和一代人的市政府精心策划、一系列公平的城市土地政策等等“浇灌”。但是当下阻力仍然很大,因为这不是一种可能受到广大

① Ndangwa Noyoo, *Social Policy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Social Re-engineering for Inclusive Development*, Routledge Contemporary South Africa Press, 2020, pp.5—7.

② Hindson O., McCarthy J., 1994. The Urban Question in South Africa: An Appraisal of Research Efforts and Institu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manuscript submitted to Emile le Bris.

白人选民、白人自由主义者或该国传统殖民政府统治下既得利益者所青睐的哲学,他们过去都从种族隔离经济措施的实施中广泛受益。实际上,“种族隔离城市”是一个受教条驱动的政治经济性产物,它只能通过对黑人家庭施加极端的苦难才会得逞。可以说,种族隔离制度故意为了白人的利益而损害约堡南部黑人社区。因此,包容性城市文化是个可以试验的好方法,至少可能在一定程度能对城市隔离起到缓释效果,或许最终能够结合其他因素共同根除这种城市所滋生的“割裂”性土壤。

An analysis of inclusive culture's mitigation of the “dual structure” of segregated cities

—Take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as an example

Abstract: The new, fully democratized South Africa is a young country that still bears the scars of its apartheid past, especially in Johannesburg, the city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apartheid struggle. In fact, Joburg has a series of “urban diseases” common to major cities in South Africa, especially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In particular, the “common disease” in the history of apartheid, on the one hand, this “common disease” is manifested in the colonial policy in shaping urban space, urban layout, urban planning and even the speed and strength of urban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social and racial inequality is subtly shaped—the actual enjoyment of urban rights is “displaced”, and the identity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space are “alienated”. The aim is to study the effectiveness of inclusiveness in South African urban culture in alleviating a “flawed city” or a “historically damaged city”, especially how much “corrective” effect inclusive culture can have on reducing the “scars” of a city’s history and on the malformed and misplaced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caused by the blindness of capitalism under the guidance of neoliberalism. Finally, it analyzes and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t value or significance of inclusiveness in urban cultur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 city and even the promotion of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a city.

Key words: Inclusive culture; Apartheid city; Dual structure; Johannesburg; Slow release

作者简介:梁凯宁,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张忠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